

|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 |

保卫社会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郑永年◎著

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民革命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 |

保卫社会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郑永年◎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卫社会 / 郑永年著.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1.1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

ISBN 978-7-213-04428-1

I . ①保… II . ①郑… III . ①社会问题—中国—文
集 IV . ①D66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1100 号

书名	保卫社会
作者	郑永年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王利波
责任校对	张彦能 杨帆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1.8万
插页	2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3-04428-1
定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编者序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收录了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评论文章。《保卫社会》是本系列的第一册，主要涵盖了作者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文章。

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综合国力显著上升。但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制度改革，使得社会越来越难以消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矛盾丛生，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紧张。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改革已然成为当今中国改革的重点。作为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理论家，郑永年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着有关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及时、客观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郑永年教授认为，“经济主义”挂帅的改革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如果再不由以“社会均衡”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加以纠正，不仅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会面临很大挑战。为此，他高声倡导“保卫社会”——政府应建立基本的社会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避免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演化成为社会危机，为中国的长期繁荣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在，编者把反映这些观点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与广大读者共享。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仅对个别文字

作了纠正。此外，每篇文章均注明了发表日期和出处，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体现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

最后，编者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给予的热情帮助，特别是王利波女士的指导和建议。

黃彥杰

2010年10月于新加坡

保卫社会
CONTENTS 目 录

第一部分 从发展第一到保护社会 1

- 经济主义的局限性 3
- 问题不仅仅在于“弱势群体” 6
- 为什么要提建设“和谐社会” 9
- “发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 12
- 中国和谐社会有待进一步制度创新 16
- 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和谐社会 20
- 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难题 24
- 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28
- 中国要平衡国家发展权和社会民生权 33

第二部分 房地产与社会改革 39

- 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 41
- 中国“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47
- 中国需要实现房地产的彻底转型 52
- 房地产改革当是中国社会建设大工程 56
- 中国建设内需社会需要做什么 61
- 中国的“房地产病” 66

第三部分 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 71

- “小康社会”与中共的政治定位 73

“小康社会”和中共的“中产阶级”观	76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	79
资本权力挑战中国和谐社会	83
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和社会的不稳定化	87
市场进入、豁免、退出和中国的改革困境	92
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命运	97
中国改革政策的困局	102
第四部分 沖突、抗议和改革动力	109
为什么要以“麻烦制造”来争取利益	111
中国社会稳定吗	114
如何认识目前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	117
中国社会改革应当扶植社会力量	120
对中国的社会冲突要有清醒的认识	124
罢工潮与中国的转型动力	129
第五部分 社会矛盾与社会暴力	135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崛起说明了什么	137
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	141
“中国墙”	146
中国社会暴力的蔓延及其后果	151
中国社会暴力蔓延的根源	155
第六部分 社会思想与道德危机	165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	167
中国当进行人本主义教育运动	172

中国的思想危机 176

 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181

 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 187

第七部分 收入分配和社会正义 193

 中国的公平经济学 195

 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199

 中国收入分配的制度缺陷 203

 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要求社会正义 207

 民生经济是中国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211

 分配公平需要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216

第八部分 中国教育改革 221

 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 223

 中国教育改制面临制度制约 226

 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 230

 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及其后果 234

 高校巨债折射出中国决策体制的弊端 240

 中国当改变“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局面 244

 中国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的恶果 249

 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254

 中国国际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259

 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 264

保卫社会

第一部分

<<< 从发展第一到保护社会

经济主义的局限性

中共十六大提“小康社会”的概念，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今后二十年领导人的努力方向，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四番。无独有偶，很多年以前，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提出了一个称之为“2020宏愿”(2020 vision)的经济发展计划，要在2020年把马来西亚提升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我们可以把小康社会称为中国的2020年计划。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提，笔者曾在早些时候的文章中分析过。这里再来分析一下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在学术界，人们一般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称之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这种类型的国家也被称为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笔者认为把这样的国家战略称之为经济主义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战略的目的是要利用经济因素来解决问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很多问题都是能够通过经济发展得到解决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经济水平的问题、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所以，走经济主义路线的国家往往只强调经济发展，而不作政治改革。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其发展经济的能力，而非人民的选票。

这种发展战略有其优势。很多问题的确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解决。实际上，邓小平很早以前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经济主义的形象说法。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的变化似乎已经打破了

经济主义的神话。很多人现在把亚洲各国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归之于这种经济主义。尽管经济主义是否继续有效有讨论的余地,但经济主义的确存在着很多局限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主义往往造就人们的金钱主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金钱意识。金钱意识的形成有它的好处,人们变得比较实在,长于理性计算,而少激进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见得对政治感兴趣,就是说,只要政府有能力改善人们的经济生活,人们就不太会挑战政府。但是从长远来看,金钱意识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压力,就是说,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转变成为政治问题。一旦经济形势不好,老百姓就会把矛头对准政府。一旦人们认为政府已经无力提升经济生活,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很快失去。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因为一国的经济早就超出该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了。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经表露得淋漓尽致。金融危机触发了政治危机。很难说,印尼的苏哈托是被本国人民推翻的还是被资本的流动所推翻的。

第二,经济主义下社会各阶层的参政机会是不公平和不对称的。在经济主义下,经济实力是主要的,参政的程度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多少。所以,资产者的参政机会就要比工人、农民的多,更不用说社会上其他的弱势群体了。不客气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政治权力从本质上说都是由资产者,或者资产者和政治人物的联盟来控制的。政治不对人民开放本身就意味着经济主义所包含的政治风险。

第三,经济主义下是不可能做到收入的公正分配的。这很简单,一是因为经济主义强调的是发展,而非分配;二是因为上述所说的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公和不对称。所谓的收入分配是由国家政权来进行的,谁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谁就能在收入分配中占有优势。一个资产者掌握国家政权的地方是很难讨论收入的合理分配的。收入分配不公中所包含的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社会的很多动乱都是由巨大的收入差

异造成的。

第四，经济主义经常造成一种虚假的合法性。经济的成功往往使得领导人骄傲，总是相信既然“给了”老百姓那么多的经济好处，他们总应该服服帖帖。再者，经验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地方，腐败总是很严重的。但是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领导人忽视腐败的严重性，甚至认为腐败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虚假的合法性经常给政权带来致命的威胁。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设想，苏哈托当时怎么也不会从那么好的经济数据中看出日后导致他下台的政治危机来的。近年来，马来西亚所面临的情况也在说明这个问题。

把上面这些问题提出来，不仅是因为经济主义已经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十六大过于强调经济主义，而对像政治改革那样的重大问题没有新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如政治参与的绝对不对称、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党政官员的严重腐败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经济主义所能胜任的。把人们引向经济主义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可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全部。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17日

问题不仅仅在于“弱势群体”

十六大以后，新领导层似乎把重点放到了社会底层。政治局委员们到各个贫穷的地方问寒嘘暖，地方领导人逐级依次仿效，一时间走访民间成了官方风气。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弱势群体”也成了海内外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人们努力把新领导层和“弱势群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有意无意地想为新领导层打造一个全新形象。不过，新领导层在治理中国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关注一下“弱势群体”那样简单。问题和“弱势群体”有关，但大大超越了“弱势群体”。

在一个“专家治国”或者“技术官僚”的时代，领导层经常倾向于把政治问题简化成为技术问题。所以，十六大以前，私营企业家成了领导层的焦点，现在则是弱势群体。一边是富人，一边是穷人，两边同等重要。从对一端的重视转向对另一端的重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无可非议，失去任何一边的支持，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但也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无穷的政治麻烦。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两者都很容易成为“政治麻烦”的根源。穷人有穷人的怨气，富人也有富人的忧虑。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是世界上最快的，但也正是这个人们梦寐以求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一个分裂的社会。和很多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受惠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导致一些社会阶层日益相对的和绝对的贫穷

化。今天，人们讨论“弱势群体”，但避而不谈这个“弱势群体”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很多研究已经发现，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理想中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的形成，中国社会仍然是金字塔构造，就是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所以才有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

尽管经济继续在发展，但要建成这个小康社会并不容易，穷人的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

在另一端，今日中国的富人也有他们的不安全感。他们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也是推动经济继续发展的主力军。正因如此，政府的政策也是一直向他们倾斜的，先是承认他们的经济成分，再是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力。照理说，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至少要比穷人安定。但现实并非如此。他们在中国积聚巨大财富，却想方设法把钱存到国外的银行；他们身处中国，但尽量把老婆小孩送往国外，自己也经常手持多本护照，随时准备出走。为什么呢？富人有足够的理由。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政府会“盯上”他们在非常规状态下所积聚的财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穷人会起来再次“革命”。

从很大程度上说，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似乎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谁也看不到社会在往哪个方向发展。由于缺少方向感而引发的焦虑应该说是必然的。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非常的动力和活力，它会毫无保留地摧毁原来的社会保护机制。在这个时候，如果政府没有能力来确立新的机制，就会造成无穷的社会恐慌和政治动荡。

中国的转型比单纯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更成问题，因为这是从计划管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东欧和前苏联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样一个转型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一个用行政和政治力量推动的过程，因此少数人容易控制和操纵这个转型过程。在俄国，就出现了黑手党政治和黑手党经济，从前受政府保护的“领导阶级”或者主流社会转

眼间就变成了“弱势群体”。中国比俄罗斯好一些，但也已经在走这样的道路了。

所以，问题远比“富人”和“穷人”问题复杂和严重。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面临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首先是人民如何“活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追求富裕生活的本能和权利，但是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少人能够像过去十几年那样来追求富裕，也不知道社会最终能否容纳得了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追求富裕的方式。

还有一个社会如何“治法”的问题。从十六大前领导层的做法来看，似乎中国已经真正成了一个富裕的社会。把一个仍然非常贫穷的社会当作富裕社会来治理，其后果会不堪设想。但是回头过来，突出穷人问题也不是解决方法。一会儿强调富人，一会儿强调穷人，会不得其所。这不是调和阶级利益，而有些使用政治策略的味道。强调富人，穷人感到被排挤出政治经济过程之外，执政党就会失去合法性；而强调穷人，则又使富人对政策走向产生疑虑。况且，把穷人的期望抬得高高的，最终又实现不了，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中国没有两党，一党代表富人，另一党代表穷人，政权轮流转；要唯一的执政党同时代表富人和穷人，自然增加了难度。

这两个问题已经出现，但要找到答案不容易。

原刊于《信报》2003年2月18日

为什么要提建设“和谐社会”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研讨班、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等场合多次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官员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落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和谐社会”更是成了近日“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热点话题和政策主题。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代领导层已经就执政方式提出了诸多理念，如“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这次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无疑是这一执政思路和理念的完善和进步。

那么，为什么要提“和谐社会”的概念呢？一句话，现在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像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要建设类似毛泽东“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乌托邦，而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原因如此简单，但光光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式的理念并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还是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这个理念。

中共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共文件中第一次将“和谐社会”的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再者，从领导层的政策意向来看，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首次置社会的和谐于经济发展之上。